

# 元代山西路府州县的设治选官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有元一代, 山西地区路府州县的地方官制经过沿袭前代, 有所变革的发展过程, 逐步形成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其间, 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不仅构成当时腹里地区官制的组成部分, 而且反映出这一时期地方行政的管理模式。本文拟对山西地区路府州县的设官结构、选官来源及其地位作用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借以对元代地方官制展开局部的微观考察, 推动元史的研究探索不断深化。

**关键词:** 元代; 山西; 设治选官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有元一代, 路府州县的设治大体沿袭金代, 却又根据情况不同有所变革, 选官任职则经历过一个军政兼行、统管并理到军民分治、各有所司的发展过程。中统三年(1262), 忽必烈开始实行地方军民的分治措施, 诏命“诸路管民官理民事, 管军官掌兵戎, 各有所司, 不相统摄”。路府州县的设治选官“大率以路领州、领县, 而腹里或有以路领府、府领州、州领县者”。<sup>[1]</sup>

山西地区诸路设置总管府后, 逐步演变成为仅低于宣慰司的地方管民行政机构<sup>[2]</sup>, 所谓“大郡为府, 府有总管, 统治州县”。<sup>[3]</sup>山西地区的各路总管常兼府尹, 掌管各路及其治所府衙的行政权力。辛丑(1241), 元太宗授李守贤之子李穀担任河东道行军万户, 兼平阳路总管。中统三年(1262), 改李穀任河东路总管, 佩金虎符。<sup>[4]</sup>至元元年(1264), 李德辉在十路宣慰司废罢以后, 转任河东山西宣慰使, 后任太原路总管兼府尹。<sup>[5]</sup>至元十年(1273), 田介以嘉议大夫宣授西京路总管兼大同府尹, 秃列秃古思以昭勇大将军担任西京路总管兼大同府尹。<sup>[6]</sup>元贞二年(1296), 元廷授任孙拱大同路总管兼任府尹。<sup>[7]</sup>

对于山西地区路级政权的长贰之官, 元统治者特别重视, 所用命官不是蒙古世宦, 就是汉族能官。在蒙古官员中, 拔都王傅伯不花之孙答刺带嗣官以后, 曾任同知大同路总管府事。秃忽鲁“自幼入侍世祖”, 被命与也先铁木儿、不忽木一起从学名儒许衡。元成宗即位以后, 其子山僧仕至晋宁路总管。<sup>[8]</sup>

有些汉族能官是从其它地区转迁而来。至元元年(1264), 忽必烈罢十路宣慰司, 授予曾担任过燕京宣抚使的李德辉出职太原路总管。<sup>[5]</sup>刘秉恕, 字长卿, 乃刘秉忠之弟。刘秉忠服劳忽必烈“以荐士自任, 嫌于私亲, 独不及秉恕”。忽必烈闻知召见, 遂侍潜邸。至元元年(1264), 转官法行, 改嘉议大夫, 历任彰德(河南省安阳)、怀孟、淄莱(今山东省淄博)、顺天(今河北省保定)、太原、平阳路总管。<sup>[9]</sup>赵璠, 云中蔚州人。癸酉(1213), 成吉思汗南伐中原, 赵璠劝众降附。中统元年(1260), 诏立十道宣慰司, 忽必烈以赵璠为顺天宣慰使。至元元年(1264), 转淄莱路总管。至元六年(1269), 改太原路总管。<sup>[10]</sup>

有些汉族忠臣能官来自于山西地区。至元三年(1266), 阳城人郑鼎迁为平阳路总管。至元十二年(1275), 郑鼎仍为平阳路总管。<sup>[11]</sup>姚天福, 字君祥, 绛州人。至元二十八年(1291), 忽必烈以姚天福为平阳府总管查治桑哥余党, “以清宿蠹”。<sup>[12]</sup>靳继昌, 潞州人。终任晋宁路同知。<sup>[13]</sup>

对于各路总管的政治动向，元统治者尤为关注，异常敏感，丝毫亦不掉以轻心，一旦发现牵连反叛或私藏兵甲，无论玩忽职守，还是图谋不规，不问族属，严惩不贷。李璫谋乱造反之初，自益都传檄，求臣叛王。平阳总管李毅移文太原，被忻州达鲁花赤阿八赤检举揭露，遂使两个总管皆以诛论。<sup>[14]</sup>中统四年（1263）六月，太原路总管攸忙兀带则以“藏甲匿户，罢职为民”。<sup>[15]</sup>

根据现已掌握的有关史料，山西地区的三路总管府下设诸官的记载较少，仅有常平仓事、转运司事、交钞大使、采木司提举、金银丹粉提领、判官等路级官员的事迹可见。丙辰（1256），徐玉充任河东南路常平仓事。“凡一路鳏寡孤独及脱著民籍之户皆兼领之”。徐德举为平阳转运经历，且以廉干著称。<sup>[16]</sup>至元二年（1265），廉希宪向忽必烈推荐张雄飞。张雄飞在召见中，侃侃陈说“当世之务”。因此，忽必烈闻言大悦，授予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sup>[17]</sup>有些官员同样来自其它地区。至元四年（1267），董源以迁转法，调西京路判官。<sup>[18]</sup>至元八年（1271），王恽自监察御史调任平阳路。至元九年（1272），授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

## 二

山西地区的诸府设有达鲁花赤、知府、同知、推官、知事、提控案牍各一员，这些官员一般都是主持府事的常设官员。<sup>[19]</sup>对于山西地区府级政权的长贰人选，元统治者同样重视，所用命官非忠实可靠者自然莫属。因此，河东山西的府级官员在维护元朝统治秩序的过程之中，忠于职守，御敌不降，乃至有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之臣。

延祐三年（1316），元英宗被立皇太子时，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举兵反叛，骤至河中。河中府达鲁花赤朵儿只趋往晋宁上报乱情，知河中府刘天孚“治战守具，选丁壮，分守要害”。当时，阿思罕“军列栅河西岸，使来索舟”，但刘天孚多次派人“至晋宁乞援兵”，等待音信。随后，阿思罕“敛船济兵”，入河中城，“以扼河渡、锁舟楫为天孚罪，欲胁使附己”。对此，刘天孚以不负皇恩，投水自尽。<sup>[20]</sup>

在天历之战中，亦有府级长贰之官尽职效命的相应例证。靳克忠，字唐臣。潞州人，知河中府。泰定帝崩，靖安王率陕西兵攻破潼关。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分兵北渡以后，靳克忠誓死守御。当时，城中官吏闻风悉遁，有人劝说靳克忠暂避兵锋。靳克忠曰：“我守臣也，去将安之”。城陷之日，靳克忠以“公服坐厅事”，被兵执至也先帖木儿军帐之前，“抗论不屈”，遂被杀害。八扎海牙，畏兀儿人。自和州转河中府达鲁花赤、陕西行台御史。也先帖木儿率军叛乱，抵河西岸。八扎海牙与知府靳克忠极力捍御，“相拒旬日，统军者宵遁”。叛军遂自大庆关渡河而进，八扎海牙被执不屈，死节于难。<sup>[21]</sup>

## 三

根据《山右石刻丛编》中的碑记落款来看，山西各州除了达鲁花以外、知州、同知、判官常设一员，这些官员往往都是主持州务的常设官员。元朝末年，官制混乱，山西地区有的州份出现知州两员、同知两员、判官两员或三员的情形。<sup>[22]</sup>

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州级政权中的长贰官员大多出自汉人世侯充任职官。中统以后，元统治者开始“颇慎推择州县之寄”<sup>[23]</sup>，特别是在“罢世侯，置牧守”以后，选官来源不断变化。有元一代州级政权的长贰官员大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其一、不同族属的外来命官。玉律徒，高唐族人，出职担任管州知州。<sup>[16]</sup>拜住，似蒙古人，任孟州守，恭敬仁爱，士民怀之。<sup>[24]</sup>

其二、汉人世侯的后代继任。汉人世侯聂珪离任还乡以后，长子聂大本承袭平定等州军民长官，次子担任汾州长官。丙辰（1256），汉人世侯刘会之孙刘怀玉承袭父职充任坚州管民长官。至元二年（1265）转迁以后，刘怀玉由坚而代，自代三仕孟、管、隰知州。刘义为汉人世侯刘恩之子，承袭父职充任辽州军民长官。至元元年（1264），升迁绛州同知。至元十七年（1280），汉人世侯靳和之子靳麟担任绛州长官。[25]韩升，隰州人，本州刺史，以策干谒木华黎，授千夫长，经略有功，授予户部尚书，佩金虎符，其子韩爽继为本州刺史。[26]杜思明，汉人世侯杜丰长子，随父出职沁州。杜丰致仕，嗣承袭任沁州长官。[27]

其三、土生土长的能官练吏。皇甫琰，襄垣人，出任泽州知州。[28]李荣祖，云中人。至正初年，知绛州事。刘璧，忻州人，历牧守，迁本州兵马都总管、知本府事。[29]郭琪，繁峙人，以洪洞尹转隆兴路推官，升迁汾州知州，加朝列大夫。[30]

其四、乡举科名入仕授官。至元十二年（1275），李怀义以乡举授冀宁路忻州知州，进阶奉议大夫，后改霍州知州。[31]庄文昭，字子麟，彰德路安阳县人。乡试燕南第五名、会试第十三名，授晋宁路潞州同知。[32]王士元，字尧佐，延祐二年（1315）进士，官国子监司业。至正四年（1344），出任知吉州事。[33]周泰，东平进士，授任潞州同知，以“文学饰吏治，一时制多出其手”。[34]宋克笃，长山（今山东省邹平县）人，“甲子进士”。至正十五年（1355）任晋宁路绛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知渠堰事。刘尚质，字仲殷，晋宁路曲沃人，“博学能文”。泰定四年（1327），以二甲进士，初授稷山县尹，“为政清廉平易”，后以潞州知州致仕。[35]

其五、京师国子监的外放官员。马祖谦，字元德，“少入乡校，日记数百言”，逾冠“来京师补国子员”。当时，朝廷方尚文学，太史齐履谦入为司业，以积分法考试诸生。马祖谦应试中选，授承事郎、同知保德州事。[36]王天佑，字国卿。“颖悟有才”，历太常奉礼郎、转国子博士，“会议大礼，多见俞允”，进阶奉议大夫，知隰州事。皇庆年间，知潞州事。[26]

其六、外地转迁的汉地流官。周景福，南阳（今河南省济源）人。至元年间，知石州事。周幹臣，长清（今山东省长清县）人。至元年间，以河东肃政廉访司知事来守潞州。王恽在送周幹臣任满赴京之际以诗赠云：“青衫白发老参军，银管聊铺两考勋。公吏检身知礼度，儿童争语说清勤。”[37]叶企颜，上蔡人。至正年间，以统军元帅知翼城县事，擢知泽州。[38]许仲杰，字汉臣，长清人。至正十三年（1353），由昆陵推官，以廉能升知保德州。[39]

山西地区各州中的同知、判官与提控案牍等辅佐官员的来历出身与知州来源大体相同，升迁调官的情形复杂。高岡，宁乡人，初任县尉。戊子（1228），升任石州军判。中统元年（1260），河东道宣慰司荐改石州同知。[40]吉祥，绛州汾西人，初为平阳课税所掾吏，寻升知事，由宝成仓使、西京务授予滨盐司副使。又任临水铁冶提举，转广平铁冶提举，升迁同知平定州事。睦大用，神峰人。延祐年间，同知汾州。韩复生，浏阳人。至正年间，担任吉州同知。吕思诚，平定州人。泰定元年（1324），擢进士第，登第二甲进士，授同知辽州事。[41]宋思齐，屯留人，潞州判官。王守忠，字信卿，潞州人。至大年间，担任隰州判官，后进绛州知州。李朝英，孟县人。至正年间，汾州判官。王思诚，兖州（今山东省兖州）人。至治元年（1321）登进士第，授任出职管州判官。[42]傅杰，晋宁路汾西人，累官河中府、绛州提控案牍。

山西地区的有些州级官员来自蒙古、回回、女真等族。延祐二年（1313），哈刺哈孙任平定州同知。至治三年（1323），那怀担任孟州同知。泰定二年（1325），哈散沙担任潞州判官。泰定四年（1327），完颜仪任潞州同知。至正二年（1342），保保担任平定同知。至正四年（1344），抄儿赤任平定州判官。至正九年（1349），暗笃刺里担任潞州判官。至正二十年（1360），哈喇不花担任绛州同知。至正二十二年（1362），阿马丹任泽州判官，脱脱出任泽州同知。[43]

根据《山右石刻丛编》中的碑记落款来看，山西地区县级政权中的达鲁花赤、县尹、主簿与县尉往往均设一员，这些官员都是处理县衙政务的常设官员。

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未定之初，县中官员是以长次确定官品的上下级别。正如《山右石刻丛编》中的《长春观记》所提到的，丙午（1246），闻喜县次三官捕盗官李，本县次官衡，本县长官贾二，本县达鲁花赤看术虎。<sup>[44]</sup>

山西各地的县尹来源大致如同知州一样，均从上述多种途径出职莅任，任官数量通常较大。不少县尹来自蒙古、契丹、回回等族，其中有的汉化程度较高，施政有为。至元十一年（1274），石抹忙古女（歹）任闻喜尹。<sup>[45]</sup>延祐、泰定年间，畏兀儿人月轮失帖木儿任万泉尹，“通经重道”，廉而有为，“尝请免赋以济民饥”。<sup>[21]</sup>至正初年，廉答失蛮由监生擢武乡县尹。廉氏起初“久客江淮，得性理之学”，“居官立身皆本平日所学”。<sup>[46]</sup>至正年间，不古鲁歹任万泉尹，“无虐政，无苛役”。<sup>[47]</sup>

元中后期，不少外来流官在山西地区的县份中担任县尹。杨致道，清苑（今河北省保定）人。天历二年（1329），由西河主簿升水文县令。<sup>[48]</sup>齐思恭，大名人。元统之中，自国子助教来任榆次县尹。<sup>[49]</sup>韩汝弼，保定人。至顺初年，知阳城尹。刘依仁，淇人。至正年间，初尹潞城，继尹屯留。韩谦，河南卫辉（今河南省新乡）人，至正年间，知平遥尹。<sup>[50]</sup>程元直，江南亳州（今安徽省亳州）人，至正年间担任交城县尹。<sup>[51]</sup>刘镛，至正四年（1344），自秘书监出尹榆次。杨乘，滨州渤海（今山东省滨州）人。至正八年（1348），任介休尹。<sup>[52]</sup>刘德新，新洺（今河北省威县）人。至正年间，以柘城（今河南省柘城县）尹调定襄县。<sup>[53]</sup>张钦祖，保定人。至正十三年（1353），任和顺尹。<sup>[54]</sup>

这一时期，山西各地县尹的权势地位颇为低下，“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谷”。<sup>[55]</sup>有的县尹还受军户殴打，甚至有遭使臣殴打致死的案件发生。至元五年（1268）三月，尚书刑部据平阳路夏县奥鲁赤李大、李三兄弟殴打本县县令致伤一案，议得李大殴打品官，予以治罪。至大元年（1308）九月，有开读圣旨使臣等人“为河东军人勾当”，将当地县尹“打伤身死”。凶犯在被捉拿“到官取问”以后，竟遇“诏旨释放了当”。<sup>[56]</sup>这些案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各地的县尹地位及其在行使职责中的不幸境遇。

主簿是一县之中的主要官员，对于县衙施政理民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山西各地的主簿之官通常辅佐县衙长官行使职权，负责办理具体事务。至元年间，任兴嗣任太平县主簿，创建文庙。<sup>[57]</sup>曲沃主簿贾天衢以宣圣庙故地卑陋，相视县城西北高爽之地，落成县学。<sup>[58]</sup>崔可仪担任寿阳主簿期间，筑浚城池，分工共理，且以勤慎著称。<sup>[59]</sup>张德邻，潞州壶关人。“素以儒业著名，遂擢簿书之任”，“所至皆有异政”。<sup>[60]</sup>至元三十年（1293），介休主簿王益率领士民继修文庙。<sup>[61]</sup>李良，中山人，由春官出任蒲县主簿，“聪察有才，屡决疑狱，颇著能声”。<sup>[62]</sup>后至元二年（1336），浑源县主簿普颜帖木儿建南岳庙。<sup>[63]</sup>至正年间，李镛任沁水簿期间，筑室城南石楼山，延请绛人郭晋以道德文章率诸生。<sup>[50]</sup>至正十一年（1341），主簿邢天杰建立荣河县署。至正十四年（1344），邢天杰又修荣河城池。<sup>[64]</sup>

山西地区不少县份的主簿兼任县尉职务。至元十八年（1281），贺福任壶关县主簿兼县尉。<sup>[65]</sup>至元二十九年（1292），撒刺儿任浮山县主簿兼县尉。<sup>[66]</sup>大德四年（1300），郑善继任平遥县主簿兼县尉。大德五年（1301），张荣任稷山县主簿兼县尉。大德八年（1304），申大雅任赵城县主簿兼县尉。大德十一年（1307），李恭祖任上党县主簿兼县尉。<sup>[67]</sup>主簿在县衙长官阙员之时，可以全权莅位任职，独署县事。至正三年（1343），李良出职判簿蒲县。由于“监邑泊尹并阙”，李良“独莅之邑”。其间，黄冠之人持有碑文与晋氏争地。对此，李良明辨真伪，归田于民，且又悉理“挂籍数年”，“争田互控”的各种案件，民称其为“廉谨律身，慈祥化俗，不妄刑一人，而四境宴然，上下安恬”。<sup>[68]</sup>

山西地区的县份之中亦有不少蒙古、契丹，或色目人等担任主簿。大德四年（1300），帖木儿不花任垣曲县主簿兼县尉。至大四年（1311），札刺儿歹任乡宁县主簿。皇庆年间，速来蛮任上党县主

簿。至顺年间，乞儿歹任闻喜县主簿。[69]孛兰奚、答里哈、咬住先后担任稷山县主簿。[70]也先不花任临晋县主簿。[71]后至元元年（1339），散木台任潞城县主簿。至正十二年（1352），散只兀台任上党县主簿。[72]至正十二年（1352），买驴担任浮山县主簿。[66]

山西各地的县尉、巡检一般是由土著任职从事，均为县衙中的捕盗之职，负有安靖一县的重要职责。蒙古军南下之际，高冈率众降附木华黎，任宁乡尉，遂使“外户不闭，累岁无犬吠之警”。[40]杜怀玉，榆次县中杜里人，生而慧达，雅好文学，尤精译语，风采峻茂。历任岢岚等地巡检。[73]武焕，至正年间任本县尉，“卓有德政”。[74]有的县份之中亦有蒙古、色目人等担任此职。稷山县就有扈不花、哈散等人担任县尉；[70]临晋县有秃绵答尔、兀鲁罕等人担任县尉；[71]太平县有乞答台担任县尉；[57]襄陵县有千家奴担任县尉。[75]夏县有布达识礼担任县尉。[76]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山西地区路府州县的设治大体沿袭金代，却又根据情况变化有所变革。山西地区诸路设置总管府后，逐步演变成为仅次于宣慰司的地方管民行政机构，所处地位非常重要，元统治者至为重视。各路总管常兼府尹，掌管各路及其治所府事的行政权力。路下设府，诸府数量通常不大，没有等级。对于河东山西路、府两级政权的长贰之官，元统治者特别重视。州是介于路、府与县之间承上启下的政权机构，所处地位较为重要，元统治者较为慎重。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品秩低微，权势地位颇为低下。这种体系不仅构成当时腹里地区官制的组成部分，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元一代的地方行政管理模式。

## 参考文献

- [1]元史[M].卷五:《世祖二》;卷五十八:《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元史[M].卷九十一:《百官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柳贯.柳侍制文集[M].卷八:《孟淳谥康靖》,上海:上海书店,1926.
- [4]元史[M].卷一百五十:《李守贤传》.
- [5]元朝名臣事略[M].卷十一:《左丞李忠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
- [6]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五:《华严寺明公和尚碑》.
- [7]元史[M].卷二百三:《孙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元史[M].卷一百三十四:《铁连传》;卷一百三十四,《秃忽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元史[M].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0]元史[M].卷一百五十,《赵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明)李侃,胡谧纂修.山西通志[M].成化十一年刊本,卷十三:《潞州庙学记》.
- [12]元史[M].卷一百六十八:《姚天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元文类[M].卷六十八:《大都路总管姚公神道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3]长治县志[M].光绪二十年刊本,卷六:《列传》.
- [14]元文类[M].卷六十四:《故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
- [15]元史[M].卷五:《世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七:《潞城王氏迁葬碑》,《袁湘碑》,《刘会碑》,《徐玉墓碑》.
- [17]元史[M].卷一百六十三:《张雄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 虞集. 滋溪文稿[M]. 卷十:《元故少中大夫江北淮东道提刑按察使董公神道碑铭》,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1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九:《诏封二贤碑阴记》; 卷三十二,《大元重修玄武殿记》.
- [20] 元史[M]. 卷一百九十三:《刘天孚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21] 蒲州府志[M]. 乾隆二十年刊本, 卷七:《宦绩》; 长治县志[M]. 光绪二十年刊本, 卷五:《集传》.
- [22]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九:《刘尚质吉州诗》; 卷四十:《官水磨记》,《龙王感应记》,《祷雨获应记》.
- [23] 胡祇适. 紫山大全集[M]. 卷十五:《潞城县尹吴公去思碑》,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 [24] 山西志辑要[M]. 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卷八:《平定州孟县》.
- [2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八:《聂珪碑》; 卷二十七:《刘会碑》; 卷二十九:《刘义碑》; 卷二十六:《新和碑》.
- [26] 隰州志[M]. 康熙四十八年刊本, 卷十七:《宦绩》.
- [27] 山西志辑要[M]. 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卷八:《沁州》.
- [28]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三十六,《泽州新修天井关夫子庙记》,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5.
- [29] 忻州志[M]. 光绪六年刊本, 卷三十一,《仕籍》.
- [30] 洪洞县志[M]. 同治十一年, 卷三:《名宦》.
- [31] 介休县志[M]. 嘉庆二十四年铅印本, 卷九:《人物》.
- [32] 庙学典礼[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199.
- [33] 吉县志[M]. 光绪五年铅印本, 卷三,《宦迹》, 卷三:《科名》。《临汾县志》,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 [34] 长治县志[M]. 光绪二十年刊本, 卷七:《循政传》.
- [3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九:《兴国寺碑》; 卷三十八:《彭克明绛州去思碑》,《山西志辑要》, 卷十:《绛州稷山》. 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 [36] 虞集. 滋溪文稿[M]. 卷十九:《元故奉训大夫昭万户府知事马君墓碣铭》.
- [37]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卷二十五:《送周录事幹臣任满赴京》.
- [38]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九,《忽都帖木儿祷雨获应记》.
- [39] 保德州志[M]. 康熙四十九年刊本, 卷六:《官师》.
- [40] 胡祇适. 紫山大全集[M]. 卷十六:《同知石州事高公神道碑》.
- [41] 陈旅. 安雅堂集[M]. 卷六:《省部政典举要序》,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6.
- [42] 元史[M]. 卷一百八十三:《王思诚传》. 卷十,《绛州稷山》.
- [4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一:《灵源宫庙碑》; 卷三十二:《重修藏山神庙碑》; 卷三十三:《重修潞州庙学记》,《感应之记》; 卷三十五:《崔府君庙祈雨记》; 卷三十六:《灵源公祈雨记》; 卷三十七:《五龙祠灵应记》; 卷四十:《旌忠庙记》;《大元祠河清记》.
- [44]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长春观记》.
- [45]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五:《闻喜重修庙学碑》.
- [46] 武乡县志[M].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卷三:《名宦》.
- [47] 万泉县志[M]. 民国六年石印本, 卷三:《政治》.

- [48] 文水县志 [M]. 光绪九年刊本, 卷十一: 《宦绩》.
- [49] 榆次县志 [M]. 同治元年刊本, 卷四: 《宦迹》.
- [50] 山西志辑要 [M]. 乾隆四十五年刊本, 卷七: 《泽州府阳城》; 卷三: 《潞安府潞城》; 卷四: 《汾州府平遥》.
- [51] 交城县志 [M]. 光绪八年刊本, 卷四: 《官政》; 卷九: 《重修庙学记》.
- [52] 汾州府志 [M]. 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卷十: 《宦绩》.
- [53] 定襄县志 [M]. 康熙五十一年刊本, 卷五: 《官师》.
- [54] 和顺县志 [M]. 民国四年铅印本, 卷六十二: 《官师》.
- [55] 李治安. 行省制度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 467.
- [56]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M]. 四十四: 《拳手伤》; 三十六: 《使臣》,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 [57] 太平县志 [M]. 光绪八年刊本, 卷八: 《职官》.
- [58]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 [M]. 卷五十三: 《絳州曲沃县新修宣圣庙碑》.
- [59] 寿阳县志 [M]. 光绪五年续修本, 卷五: 《官政》.
- [60] 沁源县志 [M].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卷六: 《县尹张公去思碑记》.
- [61] 介休县志 [M]. 嘉庆二十四年铅印本, 卷三: 《学校》.
- [62] 蒲县志 [M]. 乾隆十八年刊本, 卷六: 《官师》.
- [63] 大同府志 [M]. 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卷十五: 《祠祀》.
- [64] 荣河县志 [M]. 光绪七年刊本, 卷二: 《公署》; 卷二: 《城池》.
- [65]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二十六: 《重修玉皇七佛庙记》.
- [66] 浮山县志 [M]. 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卷二十一: 《职官》.
- [67]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二十九: 《应润庙祈雨记》, 《洞神宫碑》, 《祭霍山崇德灵应王记》; 卷三十: 《长治重修文庙学记》.
- [68] 蒲县志 [M]. 乾隆十八年刊本, 卷十: 《李公荣祖政绩碑》.
- [69]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二十九: 《垣曲文庙记》; 卷三十: 《重修大帝庙碑》, 《五龙祠诗碣》; 卷三十四: 《伯王庙碑》.
- [70] 稷山县志 [M]. 同治四年石印本, 卷三: 《职官》.
- [71] 临晋县志 [M]. 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卷六: 《职官谱》.
- [72]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三十五: 《灵泽王祠记》; 卷三十六: 《五龙神像记》.
- [73] 榆次县志 [M]. 同治元年刊本, 卷五: 《例仕》.
- [74] 武乡县志 [M]. 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卷三: 《人物》.
- [75] 襄陵县志 [M]. 民国十二年刊本, 卷十五: 《官师》.
- [76]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三十二: 《司马公塋像记》.

# On Officials in Circuits, Superior Prefecture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Abstracts:** In the process of that the official system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Shanxi Region inherited those of former Dynasties it took place new developmen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is article plans to discuss on official structure, officials' origins as well as their status and funct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pushes on the study of Officials of Circuits Superior Prefectures,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during this Dynast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Shanxi; Official system

**收稿日期:** 2006-07-15;

**基金项目:** 2004 年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元朝征服与统治下山西地区的各级政权》(0437);

**作者简介:** 瞿大风(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